



朱國光

经济论著全集



第

16

卷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劉國光

經濟論著全集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善與發展時期的反思 2003—2009 年)

第
16
卷



知識產權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目 录

八十心迹

- 在庆祝刘国光教授80华诞暨中国经济学前景恳谈会上的讲话
(2003年11月23日) 1

当前经济发展中的总量和结构问题

- 在中国经济高级论坛上的讲话 (2003年12月6日) 4

提高深圳市的竞争力

- 在深圳市第六次高级顾问会上的发言 (2003年12月8日) 11

我国经济发展形势

- 《前线》杂志社记者专访 (2003年12月) 17

宏观经济问题小论三则

- 在2004年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4年3月) 25

《公司治理、结构、机制与效率》序

- (2004年4月21日) 31

宏观调控若干问题的思考

- 在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4年秋季座谈会上的讲话

话	(2004年10月13日)	34
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答辞		
	(2005年3月)	43
当前双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		
——在首届中国杰出管理者年会上的讲话	(2005年5月)	45
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		
	(2005年7月)	55
更加重视社会公平问题		
	(2005年10月)	73
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		
——在2005年经济形势分析与经济秩序研讨会上的讲话摘要		
	(2005年10月13日)	87
在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2005年12月3日)	90
反思改革不等于反改革		
——《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	(2005年12月12日)	93
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读锦涛同志3月7日讲话有感	(2006年3月11日)	103
略论“市场化改革”		
——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不是什么？	(2006年5月)	109
不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权贵市场经济		
	(2005年11月)	125
在“刘国光经济学新论研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2005年11月23日)	129
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经验教训的总结		
——《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一书的“前言”和		

“后记” (2006年) 13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计划

(2006年3月20日) 144

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全方位改革

(2006年7月6日) 147

公平分量有多重

——关于公平和效率关系的访谈 (2006年10月3日) 151

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2006年12月7日主办的学习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研讨会上的讲话 (2006年12月7日) 159

关于当前思想理论领域一些问题的对话

(2007年6月) 164

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

(2007年) 180

应正确评估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形势

(2007年10月9日) 220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2007年10月18日) 227

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些思考

(2007年12月1日) 233

对十七大报告关于经济领域若干论述的理解

(2007年) 245

关于近期宏观调控目标的一点意见

(2008年4月23日) 265

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灵活性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深圳市政府特邀顾问刘国光
教授 (2008年8月11日) 272

“国退民进”争论的实质与发展私营经济的正确道路
(2008年) 282

计划与市场关系变革三十年及我在此过程的一些经历
(2008年) 295

在改革开放30年暨孙冶方诞辰百年纪念经济理论研讨会上的致辞
(2008年10月) 308

宏观计划调控要跟上市场化进程
(2008年10月28日) 312

解析改革开放经验 探索经济发展规律

——《纵论改革开放30年——刘国光等26位学者多视角解析》
序 (2008年11月1日) 316

《为谁作嫁?——经济学、市场和改革》序
(2008年10月) 321

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总结改革开放经验
(2008年11月) 32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当凸显创新品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序 (2009年1月) 350

进一步清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

——刘国光与杨承训的对话 (2009年1月) 353

有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板
(2009年) 366

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探索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情况的回顾

——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文献》编辑访谈纪要
(2009年) 376

八十心迹

——在庆祝刘国光教授80华诞暨 中国经济学前景恳谈会上的讲话 (2003年11月23日)

今天各位朋友在这里聚会，恳谈经济学问题，庆贺我八十岁生日，我很感谢诸位的光临。

我这八十年，是平凡的八十年，算不得有什么大出息。做了一点有益的事情，也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我衷心感谢党对我的培育。

八十年来，除了孩提时代以外，有六十多年都是与经济学打交道。我是怎样走上这条道路的呢？年轻的时候，看到祖国积弱贫穷，感到富强之路要从经济做起。高中时候，开始接触《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再加上以为经济学可能是较好的谋生手段，于是考大学时选择了经济学，以后就一直走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前，自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南联大时，又受到正规的西方经济学教育。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研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又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冲击、影响。这两种经济学在我身上交错并存。我是怎样处理它们的关系的呢？借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我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西方经济学为“用”。现在，研究经济学要有立场、观点、方法的说法，不大时兴了。但我总以为，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共产党人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说到观点和方法，我以为，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是要坚持的，但具体的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可以选择，可以借鉴，为我所用，为创建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所用。

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经历了计划与市场争论烈火与实践反复的锤炼。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计划经济在苏联、在中国，还是起过它的辉煌历史作用的。但历史也证明，计划经济毕竟不能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历史必由之路。但市场经济的缺陷很多，很多。完全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不能保证社会的公正协调发展。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有效的调控干预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引导。在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尤其要加强政府经济社会职能的作用。这是我和许多经济学界朋友们共同的信念。

以“文化大革命”为界，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研究领域主要在社会再生产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方面。因为时代背景和研究条件的限制，当时只能用抽象理论的形式，来分析探讨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增长的运动机理，避开了具体的现实经济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些探讨在许多方面，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也适用。感谢李建伟博士在《刘国光教授经济增长理论简介》（见《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11期）一文中，对我“文化大革命”前这方面的研究作了一个集中的概述。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的研究领域从经济发展扩张到经济体制，更直接接触现实经济了。二十多年来，写得比较重要的东西，都集中在最近出版的《刘国光自选集》中。这个集子的前言中写道：“如果说全书有什么中心思想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的



两重模式的转换——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发展模式的转换，可以粗略地概括我阐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感谢栢林博士在《从“双重模式”转换到“两个根本性转变”》（见《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11期）一文，对我在“文化大革命”后这方面的思想作了简略的介绍。

我的兴趣主要在宏观经济方面。多年来，对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问题比较关心。在反通货膨胀和反通货紧缩的问题上，前些年同经济学界一些朋友们进行了友好的交锋。“软着陆”的经验与扩大内需政策的采取，表明我国对付通胀和通缩的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趋于成熟，短期运行问题可无大虑。问题在于中长期农村与城市、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等能否协调发展，不致引起各种潜在的经济与社会的危机。我想这是当前我们要着重关心探讨的问题。

以上我极其简括地讲了我一些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经历的事情和考虑的问题，也算是我向诸位做的工作汇报，以回报大家的关心，表明自己的心迹。

我在经济学领域的成长，是与我敬爱的先师陈岱荪、徐毓彤、孙冶方、巫宝三等人的教导和帮助分不开的。在我八十岁生日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缅怀先师们对我的雨露恩情！

我在经济学领域的工作，与在座和不在座的经济学界同仁们的切磋、交流，同大家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我再一次向诸位先生、诸位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当前经济发展中的总量和结构问题

——在中国经济高级论坛上的讲话

(2003年12月6日)

我国经济自2002年第一季度开始，增速逐渐递增，到2003年第一季度，增速提高到9.9%，是1977年以来季度GDP的最高速度。受“非典”影响，第二季度GDP增速出现较大回落，只有6.7%，上半年增速降为8.2%。但“非典”结束后，经济迅速恢复了强劲的增长势头。第三季度GDP增速达到9.1%，前三季度为8.5%。

2003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得力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投资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5%，比上年同期加快8.2个百分点，实际增速仅次于1993年，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二高增长年份。消费需求基本恢复到“非典”前的水平，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6%，扣除物价因素，实际比上年低两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贸易保持快速增长，由于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贸易顺差比上年减少。

2003年经济增速回升，说明1998年以来的持续扩大内需政策的效应逐步显现，也说明经济内在的增长动力不断增强。从2003年投资来源看，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从上年同期增长28.4%提高到50.5%，政府预算内资金却从上年同期增长48.8%下降为2003年的2.1%，企业已经成功地取代了政府在投资增长中的主导地位。



这说明,近年来,国家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了经济增长内生机制的作用和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投资扩张动因已经从前几年的政策推动向市场自发扩张转变。

从各种经济活动的内在发展趋势看,目前我国经济似已开始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2003年预期经济增长可能达到8.5%左右。但是在此过程中,经济增长趋强动力尚不太稳定。在投资、出口、工业生产高速增长的同时,消费和就业却比较疲弱,内需尚未全面启动。消费品和生产资产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但涨势有限。前三季度零售价格指数仍在下降;10月份才开始上升,总体上物价指数仍在合理区间摆动。

同时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银行信贷扩张偏快,近来由于央行采取收缩金融措施,信贷增长幅度略有降低。二是低水平重复建设重新抬头,一些生产能力明显过剩的传统行业仍在大上项目。钢铁、汽车、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尤其引人注目。一些新兴行业、高新项目遍地开花,各种开发区过多过滥。三是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显现。四是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一些新的变化。2003年粮食继续减产,产量为1990年以来最低。2000年以来,已经4年粮食产量不足需求,目前库存比较富裕,无大虑,但未来粮食安全形势尚需观察。国庆前后,粮价发生了6年来的首次上扬,这是恢复性的,对于农民增收和粮食增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大家知道,经济增长率有现实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分。当现实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时,也就是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物价就要上涨,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当现实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时,也就是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物价就要下落,出现通货紧缩现象。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对资源利用的程度看,中国现实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劳动力利用程

度偏低，失业压力日趋严峻，城镇实际失业率达到8.4%，农村隐性失业人口1.5亿。（2）从资本使用和投入看，大量企业设备利用率较低，金融机构存贷差扩大，9月底达4.7万亿元，比2002年净增0.8万亿元。（3）2003年现实增长率估计为8.5%，扣除长期建设国债推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非典”使经济减慢0.8~1.2个百分点，经济自主增长能力在7.5%~8%。另一方面，从中长期看，由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提高、资本劳动力要素配置使用效率决定的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估计为9%~10%，这样，我国现实增长率尚处于潜在增长率的下限。

现在我国现实经济增长率正在向潜在经济增长率提升。这与当前我国正在进入新的重化工阶段这一中长期发展态势有关。但中长期发展的其他因素（如收入分配等）可能抵消经济增长率提升的趋势。即使潜在经济增长率一时达到，也有可能回摆。所以，经济生活中虽然出现某些过热现象，如房地产、钢铁、水泥等传统工业，但离真正全面过热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现实增长率仍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下，经济还没有完全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同时存在着通货膨胀的苗头。所以，在控制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时，也要防止通缩。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生产能力过剩、投资控制不好或过快，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有可能加剧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并可能出现更剧烈的价格竞争，从而导致价格进一步下降和通货紧缩趋势。

在这样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自然不能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据我看实质上是适度从松的政策），立即转向从紧（银根全面收紧）的政策，而应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只能逐步淡化转型，赤字国债规模逐步缩减，使用向“三农”、向西部、向社会发展、向生态环境、向社会保障等倾斜，同时保证必要的重点建设。宏观调控政策总体上还要继续保持某些松动，



以支持需要发展的行业和企业，增加就业岗位；对于如住房、汽车、消费类、电子通信、旅游等主要消费热点给予适当的引导；对于局部过热的经济活动，如投资、银行信贷、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过热生产，给予适当削峰的举措。总之，宏观经济政策要向中性的调控方向过渡，上下微调，适度松紧。这样既可以继续提升现实经济增长率向潜在增长率靠拢，又可以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扩大的局面。

以上是从经济总量分析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经济形势，即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来看现实增长率、潜在增长率的关系，来看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趋势。下面讲讲结构问题，就是我国经济要保持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就必须努力保持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均衡发展，关注宏观经济结构中出现的不均衡现象和趋势，努力加以扭转、消除。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不均衡，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乡发展不均衡。城市发展远远快于农村。城市居民收入高于农民收入。2002年，全社会劳动力中，有50%从事农业生产，但仅创造15.4%的GDP。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为42112元/人，而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4371元/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为3.2：1。此外，城乡居民之间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障制度、粮食供给制度、住宅制度等方面，也存在巨大差距，如把福利差距考虑在内，城乡人民生活差距实际为5~6：1。

二是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东部发展远远快于中部和西部，2002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差距较1999年有所扩大，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差距也在扩大。2002年，东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出全国平均一倍多，而中部和西部则分别较全国平均水平低12%和30%。此外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及产业结构也存在不平均，东部地区体制渐与国际接轨，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一进程

进一步加快，先行、先发优势更加明显。中西部地区明显缺乏对外开放带动国内改革的机制，在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上调整较慢。

三是投资与消费的不均衡，投资的增长远远高于消费的增长。虽然我国的投资率已然处于较高水平，但近两年又有进一步上升趋势。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从1997年占33.5%，上升到2002年的42%。2002年，我国消费率为58%，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8%和发展中国家74%的平均消费率。2003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仅增长8.6%，而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高达30.5%。按此趋势推算，2003年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份额将进一步加大，消费率将相应降低，投资和消费增长差距进一步扩大。

四是第三产业增长滞后于第二产业。现代化经济一般规律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要快于第二产业（工业）的发展。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曾有效地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得到明显改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由80年代初的21.8%增加到90年代初的33.4%。但90年代第三产业份额没有增加。2003年第三季度，全部工业增长11.8%，而第三产业仅增长5.4%，增长差距明显扩大，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

五是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我国城乡居民总体收入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是0.25，到20世纪90年代初，则超过0.3，目前已超0.45，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迅猛扩大的后果：（1）国内需求受到严重影响（消费倾向下降）；（2）影响工作、生产效率及资源配置效率；（3）形成一部分社会不安定的根源。

六是社会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在我们的工作中，追求经济增长的习惯倾向严重存在，GDP增长事实上依然作为政绩考评的主要指标，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围绕人均



GDP增长的经济建设上，政府职能在经济建设上强，在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上偏弱，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市场经济主体不应再由政府承担，转应由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来承担，政府职能应转向更多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社会发展政策提供财政保证方面来。但目前各级政府仍然把自己当作经济建设的主体，看轻自己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天然提供者的角色，仍然把发展经济当作政府的第一职责，把公共服务当作第二职责。不少地方政府直接筹划或投资于竞争性项目，特别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而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设施、社会保障等）却长期捉襟见肘。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进而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普遍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政府必须在公共需要的领域加大国家资源的投入，而且要加快从那些不属于社会真正需要的领域抽身，降低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比重，压缩虚耗浪费的公共开支，把更多的公共资源用到真正是社会公共需要的领域上来。

以上我们讲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种种不均衡、不协调，当然不止这些。例如，还有就业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资源环境的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等等。所有这些发展中的不均衡、不协调，当然不是一两年短期内能解决的，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所以，这次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要立足于“五个统筹”，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就是要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均衡、不协调问题，按照“五个统筹”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企业潜力和竞争力，建立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2004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如何,是大家关心的。从2004年经济增长的条件和环境看,尽管面临的困难不少,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但是总体上有利条件多于不利条件,国民经济可望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有利因素之一是国际环境趋好的可能性很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组织对世界经济走势估计,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增长率均高于2003年。2004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比2003年提高0.5~1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增长率也将提高1.5~3个百分点,世界经济的这种态势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二是经济增长的体制条件进一步改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对于摒弃某些限制发展的观念,打破落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将起到积极作用。三是市场活力对经济的推动将进一步增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已经由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主导型逐渐转入了政府主导与市场活力共同推动增长的新阶段,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活力逐渐加大。四是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趋于巩固,据调查,企业家和消费者对宏观经济和本行业经济发展信心增强。

当然还要看到不利因素,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当年碰到的困难和问题,这些都要认真研究解决。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总的来说是走势良好,有利条件多,虽有困难,但只要对现行政策作某些调整即可维持近期的健康发展势头。我国已取得“软着陆”的成功经验与扩大内需政策的积极成果,表明我国对付通胀和通缩的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趋于成熟,短期运行可无大虑。问题仍在于经济发展的中长期问题,即前面所述的一些非均衡发展问题,今后要予以更多的关注、研究与解决,以便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提高深圳市的竞争力

——在深圳市第六次高级顾问会上的发言
(2003年12月8日)

好几年未参加高级顾问会，也没有跟踪研究深圳的发展，了解情况不深不透。看了一点材料，讲几点感想。

1. 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曾应当时深圳党政领导的邀请，来深圳做发展战略研究。两次调研中提的一些战略目标，都已大大超额实现了。比如，1985年曾经设想，到2000年深圳人口不应超过80万~100万人，事实上2000年常住人口已达到433万人，2002年达到504万人，加上暂住的劳务工，共约760万人。超过了原来预想的几倍。又如80年代提出，到2000年工业发展速度平均是12%~15%，90年代初战略设计的GDP增长速度为20%，但事实上二十余年深圳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0%以上。近年来速度虽有所放慢，但仍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居领先地位。深圳不但创造了深圳速度，创造了深圳效益，还创造了深圳机制。在发展和改革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多个全国第一。深圳取得这样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理论和战略的指导，历届党委政府大胆的闯试精神和务实作风，调动当地和外来体脑劳动者奋勇拼搏的结果。

2. 随着中国经济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深圳面临着“特区不特”的问题。这促使深圳把“增创新优势”提到了“第二次创业”的高度。如果说第一次创业时深圳较多地依靠特殊政策，第